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研究

何玲玲 何红连 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研究

Makesizhuyi Dazhonghua Zhuanti Yanjiu

何玲玲 何红连 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题研究”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之后形成的系列研究成果,也是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的衍生产物。本书围绕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题,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如下七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历史维度比较研究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次高潮,针对性地研究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从理论基础角度研究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了受众理论视阈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问题 and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问题。这七个专题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题研究/何玲玲等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04-040193-6

I. ①马…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926 号

策划编辑 张楠 责任编辑 陈娟 任蕾 封面设计 李树龙 版式设计 王莹
责任校对 刘春萍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6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2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0193-00



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项目编号:08CKS003)的阶段性成果。



目 录

专题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比较研究 1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历史回顾 1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次高潮 2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次高潮 8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异同 17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共同点 17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差异 23
-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反思 26
 - (一) 统治阶级的思想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 26
 - (二) 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结合才能改造中国 28
 - (三) 共产党员扮演着传播者和示范者的双重角色 29
 - (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反映大众的根本利益 31

专题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 33

-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概述 33
 -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 33
 -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产生的背景 34
 - (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特点 38
-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41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41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 43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 45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和方式 47
-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52
 -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历史作用 52
 -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55

专题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 63

- 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产生的条件 63
 - (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63
 - (二)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64
- 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65
 - (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萌芽期(1927年前) 65
 - (二)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形成期(1927年—1934年) 68
 - (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成熟期(1935年—1949年) 69
 - (四)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发展期(1949年—1956年) 72
 - (五)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曲折前进期(1956年—1976年) 73
- 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75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75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 77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 80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 83
 - (五)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 90
- 四、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93
 - (一) 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93
 - (二)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94
 - (三) 坚持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 94
 - (四) 建设高素质的主体队伍,密切联系群众 95

专题四：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 97

- 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97
 - (一)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 97
 - (二)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特点 98
- 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产生条件及发展历程 102
 - (一)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产生条件 102
 - (二)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106
- 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113
 - (一)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的思想 113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的思想 115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思想 119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思想	122
四、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125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25
(二)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26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应具备较高素养	127
(四) 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128
 专题五: 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131
一、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述	131
(一) 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131
(二) 阶层分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134
(三) 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价值	140
二、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挑战及成因	142
(一) 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挑战	143
(二) 阶层分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挑战的原因	147
三、阶层分化视阈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分析	153
(一) 促进社会资源在各阶层的均衡分配	153
(二) 协调好各阶层间的利益分配	156
(三)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分众化”	158
(四) 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	160
 专题六: 基于受众理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研究	 163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内涵及其提升的紧迫性	164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内涵解析	164
(二) 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紧迫性	167
二、受众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内在关系	169
(一) 受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显示器”	169
(二) 受众影响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172
三、受众理论视阈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提升面临的制约因素	173
(一) 理论通俗化不足, 忽视受众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173
(二) 部分传播者信行失范, 引发受众的信任危机	174
(三) 传播媒介不完善, 导致受众的媒介需求错位	176
(四) 倾向单向灌输, 受众反馈渠道不畅通	178
四、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的策略	180

- (一) 细分受众以提升理论接受的分层效益 180
- (二) 塑造传播者形象以增强受众信任感 182
- (三) 整合大众传媒以扩大受众覆盖面 185
- (四) 重视信息反馈以改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86

专题七: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研究——以大学生为受众 189

-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涵义和特点 189
 - (一)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涵义及外延 190
 - (二)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特点 193
-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角色与使命 195
 - (一)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角色 195
 - (二)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的使命 202
-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发挥把关作用的原则与策略 205
 - (一) 传播者“把关”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05
 - (二) 传播者发挥“把关”作用的策略 208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21



专题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比较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群众,先后两次掀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高潮,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次高潮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继续深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长期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理论的抽象转化为理论的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变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与结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形成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形成的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差异,其内在动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并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反映出理论传播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次高潮的历史回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先后掀起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两次高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次高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近代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20世纪初的中国,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轮番侵略之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思潮,但这开启了它在中国传播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脱颖而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成功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探索。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条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具备。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实现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一步相结合,形成了党的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一系列新内容,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发展,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首要前提。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选集》中集中表现出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下旬出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深入发展。195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其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1972年5月4日,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文献资料。“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理论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条件。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以“全体大众”为宣传对象,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马克思主义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大众中进行传播,不能覆盖国统区的大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理论宣传与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备现实条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能够以“全体大众”为对象展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能够借助党和国家掌握的各种宣传媒介,如书籍、广播、宣传栏、报纸等,进行广泛宣传,覆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的大众,巩固和夯实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抵御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现实条件。

第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检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掀起第一次高潮,能够赢得大众的认同和信任,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展现了它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结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新成绩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结果,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成功有力地检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为它赢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到来提供现实支撑。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掀起第一次高潮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的动因是防止党的领导干部由于革命的胜利而沾染上不良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气。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革命胜利了,各级干部必须不断加强理论学习,防止不良思想和工作作风的侵蚀,坚决抵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密切联系群众。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全面监督；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非常重视自身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也有助于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掀起第一次高潮同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形势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进而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主体经济制度，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过渡，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之路，完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国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深刻社会转型，这必然带来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动，各种矛盾凸显，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加上1953年之后，国际国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如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所犯的错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强烈冲击。1953年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逐渐脱离实际，犯了过高估计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他将纯洁和统一人民的思想作为化解危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普及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和矛盾，毛泽东同志及时进行理论总结，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和宣传。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文简称《正处》）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随后，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正处》；1957年3月至4月，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分途南下，沿路作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理解和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

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一系列的举措一方面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性别、不同职级、不同年龄的大众中传播，逐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走向高潮；另一方面，整风运动成为毛泽东错误判断阶级斗争形势的重要转折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并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进入 60 年代后，我国周边环境变得复杂起来，除 1962 年蒋介石集团乘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企图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军事进犯计划、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增加以及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外，主要是两个战略方向上的突出变化。其一是美国明确介入越南战争；其二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所增多的边境争端和军事冲突。^① 这样的国际安全状况促使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趋于严重化。在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及其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犯了“现代修正主义”错误的同时，国内也以 1962 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三风”的批判为起点，逐渐形成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观念，毛泽东多次提到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夸大了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错误地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成为修正主义，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过火批判的现象，党的工作逐渐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从 1958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形式，是因为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避免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②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③ 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违背传播规律、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例如，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4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51 页。

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4 页。

1964年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事实上,自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起,他就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后甚至还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这种做法夸大了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和历史作用,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对毛泽东思想赢得大众的真正认同反而起到负面作用。

对于该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和部分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进行了纠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部分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例如,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①这表明中央发现并试图阻止毛泽东思想宣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进一步阐明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对于林彪扭曲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的做法和主张,邓小平等批评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实际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②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的发展,使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鼓舞了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的激情和斗志,支撑中国人民在艰难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成就,并为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对象的复杂化。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背景下展开的,它第一次有条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大众中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中共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和普通群众;包括被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这一

① 彭咏梅、树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2011)》,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② 彭咏梅、树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2011)》,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即能够依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又面临着对象复杂化的挑战,这就要求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展开针对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活动,体现差异性。第二,形式的多样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根据现有条件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宣传路径与形式。例如,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校及除军管之外的各级党政机关,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对不同文化素质的大众进行理论宣传;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创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艺术作品,包括歌曲、书籍、舞台剧、电影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大众的理论需求。第三,效果的二重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教育,有助于凝聚人心,激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另一方面,由于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被“四人帮”利用,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与个人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及其革命性等联系起来,进行政治攻击或迫害活动,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造成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一次高潮的效果必须进行客观评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归到经济建设,致力于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纠正。例如,针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路线,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②《决议》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并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次高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转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批评“两个凡是”是高举形式主义,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并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破除了“两个凡是”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大众的思想禁锢,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征程。邓小平理论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1978年12月召开了影响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对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农村改革的进程。此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的过程与理论大众化的过程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每向前发展一步,理论大众化的工作就向前推进一步。

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每产生一个新的理论观点都得到了及时的宣传普及。1981年8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进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198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这是提高党员素质和党组织战斗力、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一环;1983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强调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共产党员的头脑;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部分高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的问题,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高等院校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任务;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二号文件下发,通知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1992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并决定召开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199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要》，作为全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辅助材料；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推进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98年7月17日—19日，召开了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明确理论学习新高潮的主题。这一系列举措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同步进行的，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能够及时传达给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确保改革开放在探索前行中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引，不断攻破难关，取得新成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同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是同步的。在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前，已经针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活动。1992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1994年1月24日—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江泽民在会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5年11月6日—8日，江泽民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指出，对干部进行教育时，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由此开启了“三讲”教育活动；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同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三讲”教育进行动员部署；199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三讲”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交流“三讲”教育试点的情况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1999年6月2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1999年6月28日—29日，召开全国第二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2000年1月5日—7日，召开全国第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促进党的建设；2000年12月16日—17日，全国“三讲”教育工作总结会议召开。“三讲”教育是针对党员干部开展的、以党性党风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它既是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又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发展和完善，宣传普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也全面展开。2000年12月3日，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在农村开展了学习教育活动；2001年8月20日，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理论工作者组成的“七一”讲话宣讲